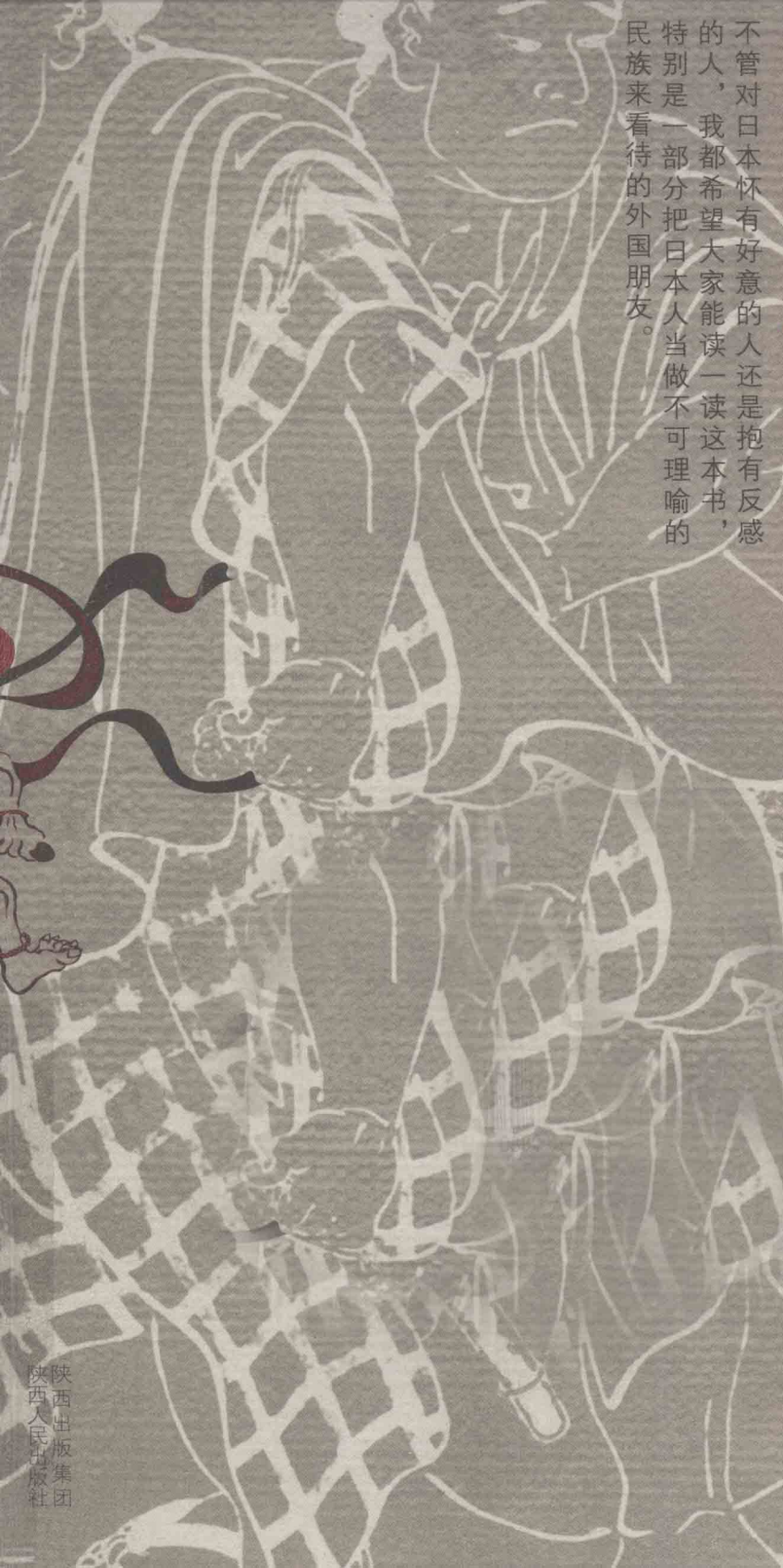


「日」岸田国土 / 著 杨晓钟 / 译

畸形的日本人

不管对日本怀有好意的人还是抱有反感的人，我都希望大家能读一读这本书，特别是一部分把日本人当做不可理喻的民族来看待的外国朋友。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日」岸田国土 / 著
杨晓钟 / 译

畸形的日本人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畸形的日本人 / (日) 岸田国土著; 杨晓钟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24 - 09763 - 4

I. ①畸… II. ①岸… ②杨… III. ①日本人 - 民族性 - 研究
IV. ①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4282 号

畸形的日本人

作 者 [日] 岸田国土

翻 译 杨晓钟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6 开 12.5 印张 1 插页 11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763 - 4

定 价 25.00 元

解 说

福田定良

岸田国土（1890～1954）作为作家、新戏剧运动的杰出倡导者而闻名于世。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极具个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透过风俗而展开的批评、评论。不过，这与战后媒体上出现的风俗批评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战后，日本人对风俗的关注程度逐渐增强。但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新时代的精神与大众新的生活意识就是通过风俗的变化来体现的。大众的思想就是风俗。在战后的文化里，大众参与的比例越大，风俗具有的意义也就越大。

可是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我们已经正确领悟了风俗所包含的重要意义。媒体文化很容易将风俗诠释为新奇、时髦的东西。虽然一些庸俗的社会心理学者对风俗进行了分析，将风俗的变化解释为大众心理变化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传媒性质的风俗批评会让我们忽视风俗与人之间的密

切而深刻的关联关系。这种形式只能捕捉到风俗变化中的部分现象。但是风俗本身是个整体（普遍）的东西，是具有伦理的东西。

同时，风俗也并非容易改弦易辙的东西。的确，潮流是属于风俗范畴内的现象之一，然而，在其背后暗藏着的是很难发生变化的风俗。以潮流的形式表现出的新风俗，除非改革创新那些不易发生变化的风俗，否则就只能仅仅停留在潮流的层面。与此相对，不易发生变化的风俗发生变化之时，也就是人类发生变化之时。潮流是由于人的互相模仿才得以传播的，而真正想要改变风俗的话，则需要每个人付出具有创造性的努力。

岸田的风俗评论，首先针对的是那些不易发生变化的风俗，是整体性、伦理性的风俗。那正是日本或者说是日本人的风俗。也就是说，他把风俗当做是极具民族性格的东西来把握。这种做法或许会被受过战后教育的人认为是因循守旧，但事实上岸田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价值正是体现在这里。

一直到战败以前，人们都倾向于将民族性的东西理解成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传统这个词，听起来十分不错，但是由于当时总是习惯把传统与国民无法置疑的无与伦比的国体联系起来，所以传统也就被理解成了观念上的、精神上的东西。这样想的话，把民族性的东西理解成风俗自然是合理的了。

不过，岸田并不只是将这种民族性的东西当做整体性风俗来把握，反而将其看做是可以改变的。改变难以改变的风俗，这里面包含了当今人类的创造性能力。换句话说，面对集体性的风俗，个人的主体性将得

到充分的发挥。从这一点来看，岸田并不像某些文化人一样，对战争中的国家动态持一种“灭私奉公”的态度。即使在战败以前，他的风俗批评也没有丧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因此，岸田的风俗批评并不像战后的一些评论那样耍小聪明、胡编乱造，而是渗透了他本人的人格与真知灼见。优秀的思想家都是不拘一格、极具个性的，岸田的风俗批评也正是如此。因此，要理解他的思想，必须要结合他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所生活的年代。

岸田的父母都出生于颇有来历的武士家族，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日俄战争爆发那一年（1904），14岁的岸田进入了名古屋地方幼年学校学习。

这件事对他的人格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或许已经很难想象出武士家庭的生活形态了，但在岸田的少年时期，也就是明治时代，日本人的家庭仍带有浓厚的士、农、工、商的风俗色彩。更何况，他的父亲是职业军人，母亲又出生于纪州藩的家老（幕府时代的诸侯的家臣之长。——译者注）之家。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或者说伪善的爱国者，但他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关注程度之深与他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绝不是毫无关联的。

根据年谱（新潮社刊《岸田国土全集》第十卷）记载，岸田在上陆军幼年学校的时候开始迷恋上了法国文学。在培养军人的学校里面，对那样的教育产生反感，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典型的“日本式”反应，然而最终又再没有谁走岸田所走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大概就是岸田的独特之处了吧。

就这样，岸田一直暗暗地迷恋着西方文学。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岸田进入军队并就任陆军少尉。但是，刚刚开始职业军人生涯的他最终却对那种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厌烦，随后便离开了军队，决心以法语作为谋生的手段。

据说岸田去法国是为了了解法国戏剧的。虽然他仅仅在法国生活了三年（1920～1922），但是在法国的生活经历和见闻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他在戏剧论中一直反复强调认真学习探讨外国戏剧的必要性。他想表达这样一种理念：不要局限于表面上的、形式上的模仿和追捧，只有抓住了外国戏剧的生命本质，才能提高日本戏剧的创造性。“学习外国戏剧固然可嘉，但是人们只是考虑如何从外国戏剧中挖掘出某种特别的‘创作技术’或者思想背景等东西，却没能探究那些戏剧‘之所以优秀的理由’，这的确是日本现代剧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进步的唯一理由。”因此，“戏剧作家们既然选择了将研究外国戏剧作为自己的工作，就不要理会那些无聊的所谓爱国心、大和魂之类的，要认真学习外语，从外国优秀的戏剧作品中发现其精髓，同时还必须将这些发现的精妙之处努力运用到我们自己的作品创作当中。”（《谈话技巧》1925）

不仅仅是针对戏剧，在对日本人的生活和日本文化进行探索时，岸田也一贯坚持这一根本的思维方式。正如在深入研究法国戏剧时他从里面感觉到了日本戏剧的本质一样，他开始尝试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摸索日本文化应该具有的形态。这种精神在他的风俗批评中随处可见。总之，他是一位以富有创造力的观点深入观察西方社会、比较鲜见的知识

分子。

但是，他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发展为德国式的理想主义。因为他是一个从根本上重视个人感觉的文学家。不过，也不能认为他看事物的观点与法国道德家式的观点毫无关系。他的风俗批评与战后的风俗时事评论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岸田认为，一个国家的风俗，是这个民族优秀的财产，是具有伦理性的东西。

岸田于“二战”期间（1940）写成的《风俗的非道德性》展示出了他的风俗观，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

当时的日本政府就喜欢搞一些道德性警告，让国民感到紧张。不过，对于岸田来说，这一事件本身就属于“现代风俗”的问题。据他来看，“国民之所以在表面上没有表现出十分紧张的样子，原因在于，政府当局也并没有表现出他们自己口中所说的那种紧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代日本人不具备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国民紧张感的表现形式。”令人感到遗憾的并不是国民没有像爱国心那样的道德心，而是我们完全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引起人与人心灵共鸣的新风俗”。

问题不在于道德，而在于风俗。如果政府与国民之间、国民与国民之间不形成一种充满人情味的关系（风俗），那么道德也只不过是伪善的温床罢了。若真是这样的话，那国民们“就必须努力创造一个能够适应个性发展、适应各个阶层、各个社会，且具有共通性的新时代风俗，而不是像军人穿的制服一样千篇一律”。毋庸多言，要想建立这种风俗，只能依赖于个人的训练。

这对于那些处于战争中的日本人来说是个太过于理想主义的憧憬。

1939年，岸田开始接触国策推进团体，最终就任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长（1940）。乍一看似乎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岸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他才会试图肯定“圣战”也有文化意义。这对那些生活在战后，并且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来说未免会感到有些滑稽。然而即使在那种环境下，相对于当时流行于世的“日本精神”，岸田还是将焦点放在了“日本风俗”上，他是一个为了创造一种全新的人性化风俗而对那些歪曲的旧风俗不惜笔墨加以批评的文化人。

不过，岸田的风俗批评真正开始展露其真实面目是始于战后。1947年11月，因其出生于陆军士官学校，又曾就任过大政翼赞会文化部长，他被开除公职。本书中收录的大部分评论都于此年之后写成。

按照时间顺序将本书中收录的评论排列如下：

1. 话语之美（1928.11）
2. 既然生在日本（1936《文学界》8月号）
3. 文艺与国语（1939.6）
4. 空地利用（1943《文学界》3月号）
5. 日本人畸形说（1947《玄想》5月号）
6. 关于平衡感（同年同刊6月号）
7. 没有恐惧的生活（同年同刊8月号）
8. 扭曲的人际关系意识（1948《玄想》新年号）
9. 关于风俗改革（同年同刊2月号）
10. 写给S夫人的信（同年时事新报4月、5月、6月）

《话语之美》收于新潮社版岸田国土全集第八卷，其他文章收于第

十卷。另外，5到9的这几篇评论，刚开始是以《没有收件人的信》为题刊登在《玄想》1947年3月号至翌年2月号上的，后收于《日本入是什么》（养德社）这一单行本里，成为这本书的主要构成部分。现将几段在书中被忍痛割舍掉了的评论要点摘录如下：

“……精神的健康，首先在于精神的自由。所谓精神自由，一言以蔽之，就是所有精神机能都能保持平衡并活跃地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常常需要打破表面的平衡，寻求一种新的平衡。要能抗拒强制、诱惑与成见，促进自然且有自律的行动。”（《关于精神的健康与不健康》1947.7）

“日本的精神如此不健康，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负起责任。同时，我希望年青一代能对不经意间从我们这一代身上继承的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给予严厉的批判。”（同上）

“不管处于怎样的世界，看问题均需透过‘自我中心的世界’，这种心理状态从精神作用这一层面来说，是最妨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这种精神没有恶意，却干扰了他人；本非所愿，却让人走向了孤独。”（《关于可悲的习性》1947.9）

“由此，‘人类风度’的两端就清晰地浮现出来了。即：一端是人与人的完全融合，另一端是人与人的离别（即孤独，笔者注）。”（《人类的风度》1947.10）

“我们国民现在的精神危机，其实不过是这种‘落伍者意识’的各种变形。我想这样断言并不怎么过分吧。因为，虽然还可以举出其他的种种原因，但是首先，我们没有哪个地方的教育告诉过大家，要同腐蚀

青春梦想却到处横行的出人头地主义作斗争，也没有教育过大家要抗拒那些残忍践踏幼小希望的命运的恶作剧，彻底捍卫‘人类’的骄傲。这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吗？”（《关于所谓的教育》1948.1）

战后，岸田风俗批评的特色首先在于其越来越强的自我反省性格。他在《日本人是什么》一文的前言里这样写道：

“这篇文章，是面向我看不见、也无法指名道姓的某个人或者很多人诉说我的忧愤之情的。对方不至于是虚构，但也没有实体，所以取名为‘没有收件人的信’……反正这些文章可能会被看做是将一些非常单纯的事情说得很玄妙、很夸张，但我要斗胆说一句，即便是这样平凡的事情，现在也需要有人站出来强烈呼吁，希望会有人能明白我的这种心情。”

“这些‘没有收件人的信’，既是写给我自己的，同时也是写给我所怀念的祖国日本的。”

“我并不是因为战败这一结果才开始对日本人的自我反省说三道四。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通过战败这一现实教训，我们要做的最紧急的课题就是，对我们久已习惯了、毫不自知的病根，要全方位地、毫不留情地相互指出来。”

“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日本的精神毁灭是必然的，但是，日本人残存下来了。如果让我想象这些日本人已经不再拥有一个完整的人所应该拥有的再度崛起的力量，我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悲伤。那么，什么东西还保留着那种力量呢？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想办法弄清楚。是那个？还是这个？或者哪个都不是。但是，我们必须一直拥有想

办法弄清楚的这种‘意志’。这本书，就是我这种意志的表现。”

的确，正如岸田自己所说，他既不是战败后战战兢兢忏悔自己战时言行的人，也不是那种立刻倒向另一边的机会主义者。不仅如此，他本质上还拥有某种不可改变的精神。

但是，虽说如此，战败还是让岸田感觉到了强烈呼吁一下的必要。书信，正是符合这种必要的形式，尤其适合反省式的表达。大概，他首先感觉到的就是有必要写给自己吧。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岸田并不是那种随便公开自己私人生活体验的人。他在1943年给《妇女公论》新年号寄去的《妻子的日记》开头这样写道：

“在这种地方说一些私密的事，这是我最不喜欢的。”

“……因此，即便是用小说的形式，把‘我’身边发生的事作为题材，不管这是不是现代文学的主流，我都是坚决无法接受的。”

这一态度，在《日本人畸形说》这本书中提到日本文学作品时我们也能窥见一二。对他而言，直接描述私人生活体验是应该与考察、表现“完整的人类形象”区别开来的。

因此，收在《日本人是什么》这本书中的文章，从形式上看，完全不会逊于战败前的风俗评论，写得非常客观。但是，其战后评论的特色就在于自我反省式的性质，只不过是岸田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已。

他断言，“日本人大多是由畸形的东西组成的”，这是一种“已经绝望于在我们之间寻求‘完整的人类形象’”的悲观论。不用说，这种

悲观论既不是感伤的悲观主义，也不是知识分子对老百姓容易抱有的那种绝望。也就是说，面对人类（日本人）最恶劣的东西，我们不退缩，而是试图看透它，是这样的一种悲观论。

另一方面，这种悲观论式的日本人观也并不是就要置之不理，静观其变，而是饱含了一种改革日本人畸形形态的决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岸田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岸田的战后评论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其国际化色彩。在《日本人是什么》的前言里，岸田这样写道：

“最后，不管是对日本怀有好意的人还是抱有反感的人，我都希望大家能读一读这本书，特别是一部分把日本人当做不可理喻的民族来看待的外国朋友。这里没有宣传，说的都是事实。我希望，这些事实能让大家在好意之外多上一层理解，而反感也不至于弄错对象，希望能收到这样的效果。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本书的出版会给他们提供进一步轻侮我们国民的口实，或者会在他们的思想里注入一些不幸的成见。因为，他们或许会非常客观地接受书中所说的，并一定会在观察、了解到书中没有明白写出的日本人的其他方面时，马上领会到原来日本人跟他们是完全一样的‘人’，是同欢喜、共悲痛的兄弟。”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不难窥见岸田作为爱国者的一面。他之所以提出“日本人畸形说”，是为了让日本人恢复精神上的平衡，并由此成为与外国人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他是因为从内心里深爱着日本人，所以才试图将那些畸形样态弄明白。

《写给S夫人的信》是写给一位欧洲女性的，给《日本人是什么》

镀上了一层国际化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具有国际化色彩，同时自我反省性质也非常鲜明。比如说，在谈到对日本人现状既绝望又依然怀有希望的那种矛盾而紧张的心理时，他是用一种近乎自白的形式来诉说的。

那么，他不放弃希望的根据又在哪里呢？

S夫人是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但仍留在日本、希望把孩子们培育成“优秀的日本人”的女性。很显然，S夫人的这种心情与有两个女儿的岸田肯定有相通之处。他希望的根据就在于深爱着的孩子们，在于对孩子们的教育。无论战败前还是战败后，教育，才是他理想主义的根源。

这本书中收入了几篇战败前岸田写的评论，是想让大家理解岸田风俗评论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不会有变化的。

《话语之美》可以当做一篇以言语行为为中心的风俗评论来读。其实从中也能看到与《日本人畸形说》相通的思维方式，只不过要注意里面还提到了言语行为与戏剧或者艺术的密切联系。岸田在欧洲学习戏剧，又指导了日本的新戏剧运动，他之所以对风俗有着如此深切的关心，其原因在这里就可以窥见一斑。

在以爱国心为主题的《既然生在日本》里，对“似是而非的爱国者与无意识的‘非国民’正慢慢占据压倒性多数”这一倾向，岸田也表明了其坚定的立场。他说，“要使日本更加美好，这个‘美好’的观念必须是世界共通的理念”。他还认为，“我们必须分清楚哪些缺点是人类共有的，哪些缺点是与日本人的优点共存的，是其特有的，然后再

对其进行相应的批判，实施相应的对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岸田战后风俗评论所共通的一种精神。

而《文艺与国语》则写出了作为戏剧界人士与知识分子的岸田对语言教育的严肃见解。他指出的“当今社会培养有用的人这一看似合理实则为机会主义的精神”，在我们当下的教育里似乎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然而，这个演讲的特色却在于，既指出了文学修养的重要性，又明确了日语中书面语与口语的不一致，自然而然地说到了风俗与教育的关系。这里，教育是被当做改善风俗、创造风俗的一种文化来看待的。从这一思维方式出发，日本教育以及一般传媒所喜好的“美谈”当然是要遭到抨击的。

不过，笔者认为，下面列举的这段话反映了岸田对文学或者艺术的一种信念，特别值得注意一下。

“我觉得文学本来就是大众的东西，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专业知识。如果有人说通俗小说很有意思，但纯文学却让人无法理解，那我甚至可以断言，这个人欠缺的并不是专业的文学知识，而是一颗包容文学的纯真的心。”

这一“断言”里所反映出的符合岸田知识分子身份的思想，在他谈论歌舞伎以及曲艺表演的文章也能看到。显然，这一“断言”是非常正确的。在大众文化日渐发达的今天，怎样将岸田的这种思考方式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自己要去考虑的问题之一。

《空地利用》，从题目我们就能感受得到，是几篇短小精悍的文章的组合。即使是他那样的人，在这一时期也不得不使用了如“报答君

恩”“美英那一帮人”之类的词汇。因此，比如在《同仇敌忾之心》一文里，我们甚至能感觉得到岸田那种苦涩的表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控制住了自己不被感情肆意支配，而是强调了“骄傲”“觉悟”（《可靠》）或者“文化感觉”（《卑俗》）的价值。而“文化感觉”总的来说就是日本人特有的风度。

“有趣的是，现在，健康的‘文化感觉’与其说潜藏在领导阶层里，还不如说潜藏在人民大众里。”

“民众不一定是‘俗人’”。岸田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大概是因为在民众的生活里，多少可以看到一些人类的风俗吧。但是，仅仅因为这样就让他摆出一副以官民一体为目标的爱国的、道德的姿态，像他那样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而在《义腹·论腹·商腹》这篇文章里，他对当时潮流的气愤之情可见一端。

这里收录的是岸田从战败前到战后所写的文章。

那个被称为战后的特殊时代也已经结束了。

但是，岸田所指出的日本人的“畸形”非但没有消灭，反而在大众文化中日渐扩大，畸形文化甚至正慢慢成为一种常态。这将导致我们越来越难以觉察到畸形的存在。

的确，我们有时候也会说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日本人是一个奇怪的种族。但很多时候，这些感受都在引起了同伴共鸣后就没了下文。等类似的场景一过，这样的感触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岸田的《日本人畸形说》也就将只具有古典意义了。因为他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那种好了伤疤忘了

痛思想和反省是要不得的。

这就将一个新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能否成为像岸田那样严肃的悲观主义者。这是一个我们不能用时代不同或者思想体系不同这样的借口来解决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无法回避岸田的悲观主义是因为，以国民的“良知”为锦旗的大众传媒被日本的畸形文化制约着，开始把排斥、抗拒这种畸形的人（尤其是青年）反倒当做是畸形的风俗来进行报道。如果民主主义行为被广泛认为是“畸形”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更不能对真正“畸形”的东西漠不关心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岸田的风俗批评也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回味。

但是，不管怎么说，岸田的悲观主义是产生于战后的日本现状的。虽然他的考察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体验以及丰富的理解，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本以及日本人也是他考察的对象，所以畸形更多的是日本式的东西。

与此相对，现在，畸形不仅仅是日本风俗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风俗的问题。换句话说，处在岸田风俗评论延长线上的日本风俗的畸形，与衍生出了越南佛教信徒自焚事件的国际风俗的畸形是无法割裂开的。本来，岸田对日本人风俗的考察就是以西方人的风俗为媒介的。不过，日本人自我反省的这种国际化性质现在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改革畸形风俗从而创造新的人类风俗，岸田的这一殷切希望恐怕将通过具有国际视野的民主主义运动而使其可能性大增。可能这种“运动”将取代他一直深切关注的教育。